

汉语言说动词后的“引语”是受事宾语吗？

杨 安娜

提要 由言说动词介引的“引语”在以往研究中常常被视作该言说动词的受事宾语，本文将从对这个看法的讨论出发，首先详细考察汉语引语具有哪些与典型受事宾语不同的句法特征，其次进一步从认知语义学角度解释引语结构内部组成成分之间的存在句法依存不对称性的问题，提供一个可以将不同引语类型（主要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作为一个“连续统”成员进行统一分析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直接引语 间接引语 受事宾语 补足语

1. 引言

关于汉语“言说动词”的研究无论是共时角度还是历时角度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学者们对言说动词进行了句法、语义、语用功能方面的描写，历时研究则更多关注这类动词的语法化过程。但无论哪种研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言说动词”后接“引语”的现象，其中大多数研究都默认其中的“言说动词”为及物动词，将其后的引语（主要讨论的是直接引语）分析为表示动作或行为施加的对象，即受事。

这种看法虽然看上去符合大多数人的语感，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比如郑远汉（1983），孙也平（1982），邢福义（1993）等学者注意到直接引语有不同于一般及物动词宾语的句法特点一即：直接引语在句中的位置非常自由，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直接引语看作谓语动词的受事宾语，而应当视为“非语言结构范畴”——“插入语”（郑远汉 1983）或者“逻辑宾语”（邢福义 1993）。应该说这些分析是中肯的，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直接引语虽然在句法上不依存于言说动词，但言说动词却依存于直接引语，这种句法上的不对称性如何用上述结论来解释？再者，上述研究只关注直接引语，而未涉及引语的另一个主要类型——间接引语，作为具有相同上位范畴的两个子范畴，我们很容易想到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必定存在一个句法和语义“连续性”（既包括相似性也包括差异性）的问题，显然“插入语”或“逻辑宾语”的看法似乎都很难兼顾到这一点。

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句法特征作以总结和补充，并尝试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进行正式讨论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 i. 本文讨论的对象既包括像“说”这样的二价动词后接引语的情况，也包括“问”这种三价动词后接“与事+引语”的情况，后者中的“引语”一般被视作“直接宾语”，¹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统一使用“受事宾语”一词来统称。
- ii. 引语通常被划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引语”三种（Leech 等 1981），²本文只讨论前两种情况。
- iii. 本文采用吴剑峰（2021）对“言说动词”的定义：指称语言性动作行为的词就是言说动词。需要提及一点的是，言说动词的配价能力不都相同，像“聊天，吵架，拌嘴”这样的一价动词的后面

¹ 即语法学界一般所说的“言说动词”充当谓语的“双宾语句”的情况，如“妈妈问你不去上海。”其中“去不去上海”通常被分析为直接宾语。

² 也有分为四类的做法，比如 Wilson（2000: 413）中分为“直接引用”、“间接引用”、“直接+间接引用”及“自由间接引用”四种。

一般不能接引语成分；同时，即便是二价和三价言说动词后接的成分也并不都是引语，如“小王问老师一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涉及言说动词“问”的话语内容，所以不是引语。这类结构的句子不作为本文的讨论对象。³

2. 对直接引语（direct quotation）的分析

本节首先探讨以往研究中涉及最多的“言说动词+直接引语”的情况。这种传统的分析方法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其根源在于“直接引语”与典型受事宾语在句法上确实具有平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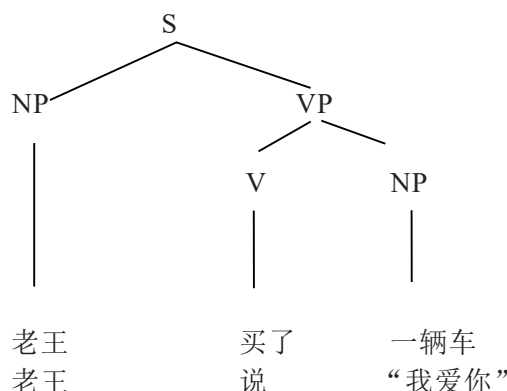
(1) a. 老王买了一辆车。⁴

b. 老王买了什么？

(2) a. 老王说：“我爱你。”

b. 老王说什么了？

如上两例所示，直接引语同典型的受事宾语一样，都可以用疑问词“什么”进行提问，即都具有指称性，所以大多数学者都接受如下成分分析：



研究言说动词的学者大多数默认这种结构分析，即引语“我爱你”同受事宾语“一辆车”一样，都表示动作过程的参与者，即谓语动词的一个论元，但仅凭这一点就断言汉语的直接引语是受事宾语的话，恐怕有些武断。下面我们将具体看一下引语不同于受事宾语的地方在哪里。

2.1 直接引语的句法特征

以往研究（郑远汉 1983，邢福义 1993）对于直接引语在句中的位置比较自由，即直接引语同言说动词具有可分离性（separability）这一特征已有论述。

具体来说，直接引语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标点符号同言说动词进行分离，并且在语音上言说动词的后面可以有明显停顿。

(3) 老人严肃地说：“我感谢你们盖了这间小草房。”（邢福义 1993）

(4) 吃完饭，他笑着燃起一袋旱烟，说：“我是给主人家送粮食来的。”（同上）

³ 如下文所提到的一些先行研究所示，很多学者没有把言说动词后接引语的情况和后接非引语的情况区分开来，都作为谓语动词的受事宾语来处理。

⁴ 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例句均为笔者所作，引自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的例句均注为 BCC。

而及物动词和后面的受事宾语是很难有语音停顿的。⁵

(5) “老王买了，一辆车。”

另外，以往研究也注意到直接引语除了像例(3)(4)那样出现在谓语动词后以外，还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如下例(6)；还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的两侧，如例(7)⁶。

(6) “少了。”沈展平斩钉截铁地说。(BCC)

(7) “你——”叔公指着他的鼻子说，“到底想干什么？”(邢福义 1993)

相比之下，受事如果想要进行类似的句法位置的移位就没那么自由。

(8) *一辆车和几件家具他买了。⁷

(9) *一辆车，他买了，和几件家具。

我们接下来再补充几个以往研究中没有提及的特征。

首先，直接引语的受影性(affectedness)程度很低，其显著表现为直接引语句式不能(或很难)转换为被动句或“把”字句。⁸

(10) 那辆车被他买了。

(11) 他把那辆车买了。

(12) * “少了。”被沈展平斩钉截铁地说。

(13) *沈展平斩钉截铁地把“少了。”说了。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被动句和“把”字句作为一个独立句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动作行为的结果导致对象发生或即将发生某种状态变化，即具有强受影性(木村 1992, 2008, 张伯江 2001, 杉村 2004 等)。Dowty (1991) 指出原型受事则包含变化性，渐成性，受动性，静态性和附庸性五个主要特征，典型的受事宾语是较多具备上述特征的(见陈平 1994, 张伯江 2000 等论述)。但我们看到，直接引语跟言说动词具有分离性，即[-附庸]；直接引语受言说动词的影响很小，因为“说某事是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使其成为真的(Monro 1982)，所以它是[-渐成]或[-变化]；没有被动态，所以是[-受动]的；最后静态性在讨论引语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可见，直接引语虽然由言

⁵ 朱德熙(1982: 110)中也认为“述语和宾语意义上和结构上的联系很紧密，当中没有停顿。”直接引语显然并不符合这个特点。

⁶ 这一测试结果也可以说是言说动词的句法位置比较自由。

⁷ 当然，由于现代汉语是话题优先型语言(Li & Thompson 1976, 徐烈炯 & 刘丹青 1998/2007)，受此影响，汉语相对于英语等印欧语言其受事更容易充任话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受事跟直接引语在句法上一样自由。只有当受事满足[+有定]或[+类指]语义，且句子的语用功能通常表达说明(刘顺 2013)的时候，才可以位于动词之前充当话题成分，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直接引语在做主题时不受这种语义语用因素影响。

⁸ 当然，在一定条件下直接引语似乎也可以成为被动句的主语：

① “我爱你”这句话被他说了好多遍了。

② “我爱你”这句话被说得没什么内涵了。

在上述两例中，直接引语看上去都充当了被动句的主语，但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出与普通引语的不同，首先谓语动词“说”在语义上更接近于“使用”，而非“传达(信息)”；其次这些句子的成立需要其他成分的介入，在这里是补语(数量补语“好多遍”和样态补语“(得)没什么内涵”)以及“这句话”这个回指结构。所以这些句子很难看作是反例。

说动词介引，但与典型受事具有很大差别：直接引语并不是言说动词谓语的一个论元。

事实上，言说动词本身就是一般表示动作行为的及物动词不同，其后能接的唯一一种名词性宾语是同义宾语，即话语、想法；而及物动词后面可以接多种受事宾语，并且受事宾语明显受到行为过程的影响。

(14) ??老王说了一个想法，一些事，几句话。

(15) 老王买了一斤韭菜、一捆大葱和几个西红柿。

上例(14)中的言说动词“说”后的名词性宾语“想法、事、话”因为在语义上具有重叠性，所以语用上是不自然的，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例(15)中的谓语动词“买”的受事宾语“韭菜、大葱、西红柿”因为不存在语义重叠，所以可以成立，并且我们也能看出例(15)的受事宾语受到动作“买”的影响——即发生位移变化。

此外，我们还找到了大量的虽然具有[+言说]义，但不具有及物性的动词（动词短语）介引直接引语例子，如：

(16) 不料，过了5分钟，突然掌声响了，戏台下还有人哭，有人喊口号：“打倒蒋介石！”。

(BCC)

(17) 临走时，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老夫的性命不保，你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BCC)

(18) 医生抢救了几下就说准备后事吧，女人立刻瘫软了下来，叫嚷着“他还小呢”。(BCC)

(19) “万……万一我……我不识字呢？”“啊，那你就完蛋了。”他也窃声呢喃。“不行，这项任务对我太不公平了！”宝儿惊吼。(BCC)

以及[-言说]义的动词短语介引直接引语的例子，如下：

(20) “车子转去看看不要紧嘛！”陈政委坚持。(BCC)

(21) “瘸子，”我冲瘸子点头。“咱们这辈子还见呢。”“不见了，”瘸子冲我摆着手。(BCC)

(22) 他摇摇晃晃地转过身，朝着黑的路指了指。“你往那儿走，见第一个——第一个路口就往左拐，在那边，过一个店铺——。”(BCC)

如果我们执意认为直接引语是言说动词的受事宾语，其前的言说动词是及物动词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面临如何解释例(16)–(19)中“喊口号”、“丢下一句话”、“叫嚷着”、“呢喃”等言说动词或短语的不及物性，以及(20)–(22)这样甚至是[-言说]义的动词的例子。或许会有人认为这些例子中省略了言说动词（“说”或“讲”），但正如朱德熙先生（1982：220-221）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省略指的是结构上必不可少的成分在一定的语法条件下没有出现的现象，而介引直接引语的言说动词在句法结构上并不是必须的，如：

(23) a. *老王说。

b. *大家都说。

c. “我爱你。”

d. “我们都爱吃你包的饺子。”

上例直接引语c和d可以在无言说动词等的情况下独立成句，而a和b这样只有言说动词却没有引语的句子却不成立，这说明言说动词在句法上并不是必须的（具体分析详见2.3节），所以“省略说”是很牵强的。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直接引语有着与受事宾语不同的句法特征，把二者等同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把直接引语默认为言说动词宾语的做法不仅仅是汉语语法学界存在的问题，这种看法曾经在英语语法学界一度也成为主流，如 Noonan (1985), Clark & Gerrig (1990) 等，⁹但随着引语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如 Partee (1973), Munro (1982), Güldemann (2001, 2008), Vandelanotte (2009a, 2009b, 2012) 等。其中 Munro (1982) 将引语的及物性问题转移到跨语言的框架中，基于大量基因无关的语言的调查，证明言说动词往往不是完全及物的。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 Munro (1982) 中的分析。

2.2 来自跨语言研究的旁证

Munro (1982) 对 40 种语言中的直接引语进行了调查，从类型学角度概括出 9 条不同于受事宾语的倾向（例句 (24) – (27) 均引自 Munro 1982）。

(i) 引语通常缺乏形态标记：

Munro 所研究的每种语言都允许言说动词¹⁰后的引语完全不加标记，如英语的例子：

(24) a. He said (*that) “I’m going.”

b. He said (that) I’m going.

Munro 文中还提到了契卡索语 (Chickasaw) 的情况，在该语言中，宾语标记为 -ā，但不能用在引语的后面。我们联想到日语也存在类似现象：宾语标记 “を” 一般也不能用来标记引语。

(ii) 言说动词对宾语有一定限制

有一些语言允许言说动词后带引语，但不允许带代词宾语，如 “it” 或具有 “词语，话语，想法” 等语义的宾语，例如，英语在有间接宾语的情况下会使用不同的动词，即 tell (告诉)。在豪萨语 (Hausa) 中有两个常用的言说动词 “céè” 和 “fàdaa”，前者用于引入直接引语，后者用于非引语宾语。也就是说，在汉语里 “他说：‘两个词。’” 和 “他说了两个词。” 都会使用动词 “说”，但在豪萨语里，前者需要用 “céè”，后者需要用 “fàdaa”，这一点也提醒我们言说动词后既可以是引语，也可以是非引语宾语，需要区分对待。

(iii) 引语与言说动词的宾语缺乏形态上的一致

在一些言说动词与单数直接宾语存在形态一致性的语言中，言说动词和引语却不存在这样的特征。Munro 举了卡维拉语 (Cahuilla) 的例子：当动词后接第三人称单数直接宾语时，都用前缀 pe- 标记动词，但 “引语或 say 动词的其他宾语不会引发这种一致”。

(iv) 将言说动词作为非及物动词处理

在作格语言 (ergative language) 中，及物动词的主语和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标记或者动词一致是不同的，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格标记为 “通格” (absolutive)，及物动词主语格标记通常为 “作格” (ergative)。在萨摩亚语 (Samoan) 中，言说动词的主语是无标记的，或者标记为 “通格”，而非 “作格”，可见，它是把言说动词作为非及物动词来处理的。

⁹ 英语语法界的传统观点在分析引语和言说动词关系时，通常使用 “直接宾语 (direct object)” 这个术语。英欧语法中的 “宾语” (object) 指的是及物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接受者。其中直接受到动作影响的名词或代词被称为 “直接宾语 (direct object)” (参照 龟井孝 河野六郎 千野荣一 (1996: 1304, 1339))。这一术语大致对应于汉语的 “受事宾语”。

¹⁰ Munro 原文使用的是 “‘Say’ Verbs” 一词。

(v) 对言说动词被动态 (passivization) 的限制

除了我们上文讨论的汉语言说动词很难出现在被动句的例子以外, 英语的直接引语也很难作为被动句的主语出现,¹¹如:

(25) a.? * “Help!” was said.

b.? * It was said (to me) (by some), “Your house is haunted.”

(vi) 将引语处理为间接格 (oblique)

Munro 还提到了具有“转换参照系统 (switch-reference system)”语言中对引语的特殊处理方法。该系统将主语与主句主语相同的从句和主语与主句主语不同的从句区分开来。例如, 在尤曼 (Yuman) 语系中, 如果从句的主语和主句的主语相同, 使用后缀 -k 标记从句; 如果从句的主语和主句的主语不同, 则使用后缀 -m 来标记从句。然而无论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 通常都使用后缀 -k。

(26) M-isay-k ’-i’ ii-m.

you-fat-?? I-say-tns

‘I say you’ re fat’, ‘I say, “You’ re fat”’.

Munro 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是, -k 先语法化为主题标记, 后发展为引语从句的标记。她认为无论如何, “这些分句的地位显然不是直接宾语成分”。

(vii) 将引语处理为非句子成分 (non-constituent)

Munro 提到了皮马语 (Pima), 它对语序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即在第二个位置的辅助成分 (auxiliary element)¹²前只能有一个成分。重要的是, 引语是唯一一个可以在辅助成分之前出现不止一个成分的例子。Munro 认为, 皮马语使用者似乎把引语当作不属于“句子或言说动词句”的构成成分, 言说动词不能是及物动词, 因为如果是及物动词的话, 引语就是直接宾语, 则必须遵守位于首位的限制。

(viii) 引语和其他宾语从句的语序 (Word Order) 差异

在 Munro 调查的语言中, 完全不标记引语是一个普遍现象, 在这些语言中, 这种句法选择通常是“其他类型的宾语补足语所不可能具有的”。例如, 在契卡索语 (Chickasaw) 中, 引语从句可能处于一个“框架式”结构——即, 前面和后面都有一个“说”的转折形式中, 而都没有其他动词的宾语从句以这种“框架”结构出现。在尤曼语中, 直接宾语从句可以出现在主语和高阶动词 (higher verb) 之间的中心嵌入位置 (典型的直接宾语位置), 然而引语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ix) 引语句法与其他非及物动词结构的相似性

带有动词的引语结构在句法测试中的表现并不像及物动词结构, 反而同许多非及物动词结构具有相似性。Munro 提到的一个共性是英语倒装句测试的例子。

¹¹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的语言对于引语被动态的出现显得更为“宽容”。比如日语:
「助けて!」って彼に言われた。

¹² 这些辅助成分表示主语的人称、数、语气、体等句子特征。(Munro1982)

- (27) a. “What's up?” said/asked John. / John said/asked, “What's up?”
 b. The capital of New York is Albany. / Albany is the capital of New York.
 c. In front of the fire was/sat my brother. / My brother was/sat in front of the fire.
 d. Up came Mr. Hopkins. / Mr. Hopkins came up.

能够接受倒装的简单句有：带有言说动词的直接引语句，跟系动词句（copular sentences），定位句以及带有方向性副词的句子，而典型的及物动词句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倒装。显然，英语里的直接引语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直接宾语。

自 Munro (1982) 之后，近年随着海外对引语现象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发现将言说动词视作及物动词，把引语分析为受事宾语的做法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许多语言用来引入引语的成分（即引语标记（quotative marker））¹³并不具有所谓的及物性，甚至于很多不含有[言说]义，甚至是非动词词汇。比如根据 Güldemann (2008) 对非洲语言所作的调查结果，以及 Buchstaller & Van Alphen (2012) 对引语标记类型的总结，¹⁴可以引入直接引语的除了[+言说]义动词以外，还有“相似（similarity）/近似 approximation）、“等式（equation）”、“开始（inchoativity）”、“移动（motion）”、“行为（action）”等语义的动词；最为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数量词（quantifiers）、指示词（demonstrative deictic）等非动词类词汇来源的词也可以具有引语标记的功能。而且即便从数量上来看，由言说动词来引入引语的情形很可能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¹⁵

我们通过对汉语的测试，发现同其他很多语言一样，汉语的言说动词和直接引语之间也不存在句法上的支配关系，对于直接引语也不能像受事那样理解为动作行为过程的直接参与者，需要从结构或构式（construction）的角度来思考引语及其介引成分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比如对于“老王说：‘我爱你。’”这个句子，我们应该分析为：“老王说”作为一个整体引出后面的“‘我爱你’”这个引语小句。这样分析也正好符合学界对于引语分析的一个通行方法，即：将引语句分为“引导句（reporting/ introductory clause）”和“引语句（reported/quoted clause）”两个部分。¹⁶接下来我们将使用“引导句”和“引语句”的说法继续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2.3 引导句和引语句法依存的不对称性

我们通过上节中的考察验证了汉语直接引语的引导句和引语句在句法上不存在支配关系，并从类型学研究的成果中看到上述特征具有跨语言的共性，到这里，我们使用以往学者提出的“插入语”来解释直接引语的句法地位似乎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引导句和引语句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此。

¹³ 如下文所提到的那样，可以引入直接引语的成分既包括语义相对具体的动词，也包括语义泛化的指示词等，它们虽然都经历了一定的语法化，但程度有别，所以有些学者如 Güldemann (2001, 2008 等) 使用 “quotative indexes” (引语索引词) 来总称这类词；也有学者直接使用 “quotative marker” 这个术语 (Hasund et al, 2012; Oshima & Sano 2012 等)。

¹⁴ Buchstaller & Van Alphen (2012: XIV) 的归纳基于最近二十几年类型学文献（具体文献列表参见该书注（5））中对不同地区且很多在类型学基因上没有渊源的语言中新出现的所谓“创新引语（innovation quotation）”的研究结果，该文还同 Güldemann (2001, 2008) 里提到的“旧”引语形式进行了比较，发现新旧引语标记的语义来源很多都是重叠的，因此他们认为“虽然引语形式的突然增多似乎是一种新的发展，但这些创新形式的来源却肯定不是新的。” (Buchstaller & Van Alphen (2012: XIX))。

¹⁵ Güldemann (2008: 372) 对非洲 39 种语言中的引语结构进行的大规模研究表明：“在 QI [即 quotative indexes—笔者注] 中，用于常规非词汇功能的言语动词与其他词项的比例几乎是 1:5”。(“the overall picture is quite unequivocal for the sample: the ratio of speech verbs vs. other items regarding their recruitment for regular non-lexical function in QIs and beyond is almost 1:5.”)

¹⁶ 中文译语参照乐耀 (2013)

我们发现二者的句法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如例（7）所示，引导句可以位于引语中间，即中断引语，反之则不然，如下面这个例子。

（28）*老王“我爱你”说。

另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直接引语句可以脱离引导句而单独出现，但引导句在句法上依存于引语句，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例句（23）。

- （23）a. *老王说。
b. *大家都说。
c. “我爱你。”
d. “我们都爱吃你包的饺子。”

总之，汉语的引导句在句法上不能独立成句，而引语句却可以。那么具有分裂性的引导句和引用句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又因为什么存在不对称的依存关系呢？以现有的观点较难提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在这里将参考 Vandelandotte（2009a, 2009b, 2012）的分析思路尝试从认知语义学中的“概念依存”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Langacker（1987：277-278）认为两个组成表达式只有具有某些共同的子结构才能整合成一个复合结构，所以这种整合以组成结构中子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s）为基础。比如，在[UNDER-THE-TABLE]这个结构中，[UNDER]勾画的是两个抽象事物（即射体 tr 和界标 lm）之间的空间关系，[THE-TABLE]勾画的是一个具体事物——（特定的）桌子，这两个组成结构的复合通过[UNDER]的界标和[THE-TABLE]的侧面之间的对应关系得以实现，其中[UNDER]的子结构——界标（lm）是图示化的凸显子结构（salient substructure），[THE-TABLE]是对该子结构的阐释。Langacker（1987：304）将图式化的凸显子结构称为“阐述位（elaboration site，简称为 e-site）”。

通常情况下，被整合在一起的组成结构间会表现出“严重的不对称”（Langacker 1987：300）。这种不对称可以用“概念依存性”¹⁷来说明，即其中一个组成结构 D 依存于另一个结构 A，因为 A 是对 D 中一个凸显子结构的阐述（Langacker 1987：300）。根据上面的叙述，可以确定在[UNDER-THE-TABLE]中，[UNDER]在概念上是依存的（D）；而[THE-TABLE]则是概念自主的（A）。¹⁸

对于一个复合结构而言，仅仅确定概念依存/自主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不足以区分一些相对应的语法概念，比如“中心语-补足语（head-complement）”关系和“中心语-修饰语（head-modifier）”关系，这里还需要确定“中心语”。Langacker（1987:289）从侧面决定体（profile determinant）的角度对“中心语”进行了定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复合结构只需继承其一个组件的侧面即可。其侧面被继承的组件结构将被称为结构的侧面决定体。

¹⁷ Langacker（1987）所提出的“依存”概念不同于之前“依存语法（dependency grammar）”中的“依存”概念，为了区分二者，Langacker 使用“dependence”这个术语区别于以往的“dependency”，他明确提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背道而驰，比如，依据“依存语法”的观点，名词论元（nominal arguments）被认为依存于动词或形容词等关系谓词（relational predication），而依据 Langacker 的概念依存观点，这些关系谓词在概念上是依存于名词论元的（参见 Langacker 1987：306）。

¹⁸ 概念依存和自主是相对的，被确认为“概念自主”的组成结构也并不排除它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概念依存”的组成结构（参照 Langacker 1987：301）。

拿[UNDER-THE-TABLE]这个结构来说，整体陈述的是一个空间关系，因而[UNDER]在该结构式中是侧面决定体。这样[UNDER]就是“中心语”。那么[THE-TABLE]是“补足语”还是“修饰语”呢？Langacker（1987：309）认为当概念依存结构（即 D）是侧面决定体时，概念自主结构（即 A）就是概念依存结构的补足语。[UNDER]既是中心语也是 D，因此[THE-TABLE]（A）为补足语，而非修饰语。

Vandelanotte（2009a，2009b，2012）根据上述有关概念依存的分析，建议将整个引语句式（引导句+引用句）概念化为一个依存结构，它有一个“阐述位(elaboration-site)”，这个阐述位需要引语句来完成精细化，也就是说，一个引语句式包括了一个概念上具有依存性的引导句和一个概念上自主的引语句组成，引导句需要引用句来完成语义，反之则不然。引导句是所谓的中心语(head)，而引语句则是概念上的补足语(complement)。我们可以参照 Vandelanotte（2009a，2009b，2012）的做法，将“老王说：‘我爱你’。”这个直接引语结构图示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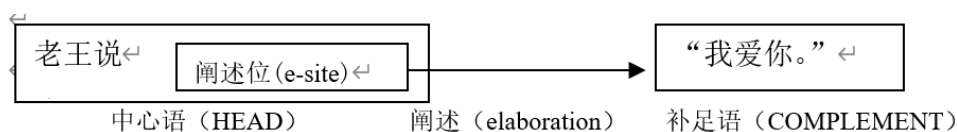


图1 直接引语的概念依存结构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补足语(complement)不同于汉语的“补语”概念。我们在这里对二者进行简要说明。根据沈家煊（2010）、邵菁等（2011）的总结：印欧语的 complement 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 complement 只指接在系动词后对主语或宾语进行补充说明的成分；广义的指包括谓语中除动词之外的所有必需成分。Complement 与 modifier（修饰语）的不同在于：修饰语对于中心语来说在句法上可有可无，而 complement 对于中心语而言是强制性的。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补语”指的是动词（或形容词）后除宾语外的其他所有成分。可见，汉语的“补语”同 complement 的外延不同。对于汉语“补语”这个概念应该如何定义，笔者暂无能力进行深入探讨，但仅就引语可出现的句法位置来说，很难将其分类到现有的“补语”范畴之下。看一下下面这些例子。

- (29) 他像个“丧家犬”。
- (30) 他跟个“丧家犬”一样灰溜溜地走了。
- (31) 他哭得像个“丧家犬”。
- (32) “丧家犬”就是他。
- (33) 我不理他，他还来劲儿了？“丧家犬”！

其中“丧家犬”是“喻体”，可以看作是说话人对他人（包括语言社团）思维内容的引用，因此属于“引语”，但按照目前汉语学界的观点，(29)中的“丧家犬”通常被分析为系动词“像”的宾语，(30)“丧家犬”作为引语句连同引导句“跟个……一样”一起作状语，(31)“丧家犬”作为引语句连同引导句“像个”一起作样态补语，(32)“丧家犬”在“零引导句”的情况下作主题，(33)“丧家犬”在“零引导句”的情况下在句中充当插入语。

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引语不仅可以位于动词之后，还能占据其他句法位置，这与汉语传统语法中的“补语”定义是不符的，¹⁹而英语中广义的 complement（补足语）概念只涉及语义关系，所以

¹⁹ 依据邵菁等（2011）对现代汉语语法理论中“补语”的内涵和外延演变的回顾，黎锦熙（1924）最早使用“补足语”这个术语时，其概念与英语的 complement 是一致的，自赵元任（1968）之后将系动词后面的补足语（如“他

可能更适合用来概括汉语引语的句法特点。

事实上，汉语引语结构并不只采用单一的句法类型来编码，这一特征同样也具有跨语言的共性（Buchstraller2004；Clark and Gerrig1990；Collins2001，Spronck2012 等），这提醒我们在研究汉语引语现象的时候，不应该依据句法参数来定义引语，而应该从话语功能和语义、语用特征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3. 对间接引语（indirect quotation）的分析

相对于直接引语，以往关于言说动词后接间接引语句式的分析显得较为“薄弱”，大多相关论述都把它视为二价言说动词的“受事宾语”或三价言说动词后面的“直接宾语”。如袁毓林（1998：191）把下面两句中的主动词“劝”，“骂”归为二价动词，其关联的两个从属成份—即配价为“施事”和“受事”，其中的“他早点休息”和“我不思上进”是受事。

（34）你劝他早点休息吧。（袁毓林 1998：191）

（35）我爸老骂我不思上进。（同上）

另，袁文还把下面“表示称号”的三价动词后接的间接引语“大爷”，“大笨蛋”，“活雷锋”也分析为受事。

（36）胖胖叫我大爷。（袁毓林 1998：292）

（37）爸爸骂弟弟（是）大笨蛋。

（38）大家夸他（为）活雷锋。

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历时研究中。比如，汪维辉（2003）把虽然没有使用“间接引语”这个词，但在他的例句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并且都被分析为言说动词²⁰的直接宾语。

（39）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诗经·召南 行露》/汪维辉 2003）

另，杜道流（2005）认为下句中的“相国何为”为间接引语，充当受事宾语。

（40）汉十二年，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史记·萧相国世家》/杜道流 2005）

上述处理没有受到质疑，很可能跟“间接引语”的句法特征有着极大的关联。首先，间接引语并不像直接引语那样比较直观，容易分辨，比如对于直接引语，现代汉语中会使用标点符号（：“”）来表示，古代汉语或许可以根据一些指示语或句末语气词（“焉”，“乎”，“邪”，“矣”等）来进行判断，²¹而间接引语句跟引导句中的谓语动词看起来更像“动作-受事”的关系，所以更难察觉到间接引语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间接引语同直接引语一样很难视作受事宾语，比如间接引语句也很难转换为被动句、“把”字句。

像我”）处理成宾语，将动词后除宾语外的其他所有成分均处理为补语，现在许多汉语语言研究者使用 complement 来翻译“补语”，造成了一定混乱。另外依据句法分布一刀切地把动词后除宾语外的所有成分都处理为“补语”的做法是否合适，学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参见金立鑫 2009，沈家煊 2010）。

²⁰ 汪文中用的是“说类词”这个词。

²¹ 实际上依据这些成分来判断古汉语的直接引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指示语中的第二人称在古汉语中受到礼貌原则的作用，无论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都可以使用“子，先生”等名词性称谓（董秀芳 2008），句末语气词中哪些只能用于直接引语，哪些又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都能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37) 爸爸骂弟弟(是) 大笨蛋。
 (37)' a. *大笨蛋被爸爸骂弟弟。
 b. *爸爸把大笨蛋骂弟弟。

但是典型的双宾语句的受事宾语(即相关研究中所说的“直接宾语”)在“有定”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这种转换。

- (41) a. 他给了我妹妹他最喜欢的衣服。
 b. 他最喜欢的衣服被他给了我妹妹。
 c. 他把他最喜欢的衣服给了我妹妹。

同时, 间接引语句和引导句在句法依存关系上也存在不对称性。

- (35) 我爸老骂我不思上进。(袁毓林 1998: 191)
 (35)' a. *我爸老骂。
 b. ?我不思上进。

例(35)中“我不思上进”是谓语动词“我爸老骂”这个引导句介引的间接引语句, 引导句需要出现引语句对其进行语义阐述(或补充), 所以(35)' a 不成立; 但是引语句在引导句不出现的情况下虽然语义有所不同, 但句法上是成立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整个间接引语结构来说, 引导句和引语句之间也存在依存不对称的特点。我们同样可以图式化这种关系, 即: 间接引语句是引导句的补足语, 是对整个引导句的阐述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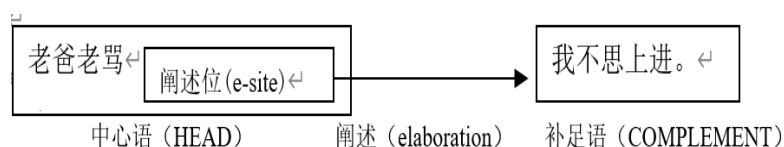


图2 间接引语的概念依存结构

当然, 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在句法特征上也存在不同。下一节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

3.1. 间接引语对句子类型的限制

据笔者所见, 望月(1976)是最早对现代汉语直接引语间接化(即转换为“间接引语”-笔者注)现象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他指出汉语同日语, 英语一样, 直接引语对基本句类几乎没有限制, 它可以是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命令句, 甚至是句法有误的句子或外语; 相比之下而间接引语则受到很多限制。如下面几例(例(42)-(47)引自望月 1976)。

[陈述句]

- (42) a. 他说: “好。”
 b. 他答应了。

[疑问句]

- (43) a. 他说: “你有字典吗?”
 b. 他问我有没有字典。

[感叹句]

- (44) a. 他说：“你们这一对儿够多么漂亮啊！”
b. 他说我们这一对儿真够漂亮。

[命令句]

- (45) a. 他说：“把他们带走！”
b. 他说，叫我把他们带走。

[病句或外语]

- (46) 他说：“你们都去不去？”（此处“你们都去不去”要改成“你们都去吗？”-望月注）
(47) 他说：“Sayoonal!”

上例（42）-（45）各句中的 a 为直接引语句，b 为间接引语句，通过比较我们很容易看出间接引语句跟直接引语句相比受到了诸多限制，比如间接引语句不能添加语气助词“吧，吗，嘛，啊”，要进行指示语（deixis）的转换，甚至于需要改变句子结构，还有像例（46）（47）这样无法转换成间接引语的句子（详细分析请参见望月 1976）。

3.2. 间接引语的引导句的句法位置相对固定且通常需要存在

如上文所述，直接引语句的引导句可以位于引语句的前面，中间以及后面，但间接引语句的引导句通常要位于引语句的前面。我们用袁毓林（1998：191）中的例子来作个测试：

- (48) a. 他说我们这一对儿真够漂亮。（袁毓林 1998：191）
b. 我们这一对儿真够漂亮，他说。

上例（48b）当引导句位于句末时，一般会解读为直接引语，而非间接引语。

此外，只要有足够的上下文语境线索，直接引语可以在没有明确的引导句的情况下出现，而对于间接引语而言，对引导句出现的要求则很高。

- (49) 我上星期碰到大学同学。“你最近混得怎么样？你咋不跟我联系呢？”他对我表现得很热情。
(50) “我上星期碰到大学同学。我最近混得怎么样，我咋不跟他联系，他对我表现得很热情。”

例（49）虽然没有明显的引导句，但不妨碍我们根据上下文推断划线部分是直接引语，但是例（50）划线部分由于发生了人称指示语的转换（“我”，“他”），通常来说应该被解读为间接引语，但因为没有引导句的介引而显得不自然。

总之，无论是直接引语结构还是间接引语结构，引导句和引语句之间的依存关系都具有不对称性（即引导句依存于引语句，而引语句具有自主性），但是相比之下，前者的引语句的自主性更强，而后者的引语句的自主性相对较弱，更需要引导句出现在话语中。正如 Langacker（1987：310）分析的那样：概念依存在本质上是一个程度（degree）问题，因为概念依存理论的核心概念——显著性（salience）和阐述（elaboration）在本质上是标量（scalar）的。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尽管间接引语跟直接引语相比自主程度要低，但就其与引导句间的概念不对称关系而言，间接引语仍然是自主小句，只要给够足够的语境支持，间接引语也可以脱离引导句的句法支配，如：

- (51) A：老师昨天把你叫到办公室，跟你说什么了？

B: 让我明天早点儿来学校。

上面的 B 句在这个语境下可理解为脱离了引导句“老师说”的间接引语。²²

以上, 我们从认知语义学视角对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做了统一的分析, 将二者纳入“complement (补足语)”这一语义概念 (而非句法概念) 的范畴下, 在此范畴中, 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处于连续统的两端, 且两种引语虽然都具有自主性, 但存在程度差别: 直接引语自主性程度高于间接引语。

4. 结语与余论

本文对汉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不同于受事宾语的句法特征做了整理, 指出以往研究中将引语视为言说动词受事宾语这一观点的问题所在, 并进一步考察了引语结构内部成分-引导句和引语句之间的句法不对称性现象, 尝试从认知语义学角度做出了解释。

确认引语不同于受事宾语这一事实, 同时也为我们思考一些认证义动词 (或称作“意象动词”) 和引语 (通常是间接引语) 之间的关系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比如在讨论与后接小句句融合度/结合度问题的时候, 认证义动词 (“保” “恭喜” “同意” 等) 普遍低于其他行为动词, 如 “用” “替” “跟” (孙朝奋等 2005)²³, 其原因可能跟这些认证义动词后的小句是间接引语,²⁴ 与这些动词之间的句法支配关系相对于行为动词与其受事宾语的句法支配关系比较松散的原因所致。

此外, 把引语视为补足语, 而不是受事宾语, 还可以避免将言说动词赋予及物性的错误分析, 促使我们把关注的焦点由介引引语的言语动词本身的语义转到引语结构中引导句和引语句间的关系上。本文最后谈及一下上述结论可能对历时研究提供的启示。

诸多学者已从历时角度证实言说动词可以语法化为“标句词”, “条件连词”, “句尾语气助词”, “话题标记” 和 “言据标记” 等 (参见谷峰 2007, 方梅 2006, 刘丹青 2006, 随利芳 2007, 张赫, 崔越 2017 等), 如果我们从引语结构的特点出发, 认识到由言说动词构成的引导句和其后的的小句-引语句 (包括直接引语, 间接引语等) 之间的语义关系并不是典型的 “动作-受事” 的关系, 引语句的语义功能在于对引导句进行阐释说明的话, 也许可以对以上语法化现象进行统一的解释-即这些成分都不是句子的主要成分, 使用这些结构的目的是在主要句子中插入附加信息, 从而使语句更加详细或清晰。

其次,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 以往研究由于把引语视作言说动词的受事, 默认言说动词具有及物性, 那么在探讨其语法化途径时, 就需要解释言说动词的及物性是如何虚化的, 比如方梅 (2006) 认为言说动词在向标句词语法化过程经历了 “准标句词” 这个中间阶段 (即 “说” 与认识义, 静态动词或系动词连用的情况), 此时 “说” 是一个附属成分; 但同时她也承认存在下面这样 “说” 既不依附于前面动词, 也不依附于后面小句的例子。

²² 我们文中已经说过, 间接引语句在句法和语义上要更加依存于引导句, 所以如果没有语境支持的话, (51) B 句就会和例 (48)’ b 一样通常不被解读为间接引语。

²³ 孙朝奋等 (2005) 借鉴了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对现代汉语 “连动式” (包括传统的兼语句和连谓句) 进行了分析, 排列出 “句子融合度连续统”, 其中绝大部分是符合语言事实的, 但对于其中个别句子的融合度高低排列上似乎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如 “他救我上船” 被列到比 “他保我赢” 和 “我以为他喝酒” 融合度更低的位置上, 但按照其文中所采用的测试方法: 第二个动词小句真值条件是否可以取消来测试的话, “*?他救我上船, 我没上”, “他保我赢, 我没赢。” “我以为他喝酒, 他没喝。” 这个结果显示 “以为” “保” 对于后项动词的控制度要低于 “救”, 所以似乎应该排在其下。

²⁴ 根据 Buchstaller (2014: 43) 的定义, 引语结构至少包含一个引用的信息和表明这个信息的来源 (一般为不同于 t_0 时间点说话者的说话者)。比如, 当我们说出 “他保我赢” 这句话时, 我们作为 t_0 时间点的说话者间接引用了 “他” 在更早的时间点 t_{-1} 时所说的话-即 “我保你赢” 之类的话。此外, Buchstaller (2014) 也认为: “引语可以是自我引用, 说话者可以引用自己最初在 t_{-1} 时所说的话或持有的思想, 然后在 t_0 时进行报告。” 比如: “我以为他喝酒。” 这个句子就可以视作说话者在 t_0 时引用自己在 t_{-1} 时所说的话或想法, 即自我引用。

(52)“我听说书面协议还有这样一条,说,吴士宏到本公司工作,不得再像在微软工作那样,写出一本类似于《逆风飞扬》的书。”(方梅 2006)

那么“说”到底是不是一个附属成分?到底需不需要要经历与认识义等动词连用的阶段?对于这个问题恐怕较难解释。如果我们赞同 Spronk (2012) 等研究的观点:“引语结构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句法和语义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特定的意义趋向于语法化”,把方文中所设置的“准标句词”阶段改为“间接引语结构”阶段的话,也许就可以回避这个矛盾。即:这些具有引用功能的言说动词在进入“间接引语结构”(或语境)时,就具备了进一步语法化的条件,而所谓的“认识义,静态动词或系动词”也只是构建“间接引语结构”的一些要素,但并不是必要要素。

总之,近年来,虽然汉语学界对于引语结构的研究有了一定深入,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尤其是还没有跟言说动词研究进行较好的结合,我们期待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中文]

- 陈平 1994. 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份的配位原则,《中国语文》第 3 期: 161-168。
- 董秀芳 2008. 实际语篇中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混用现象,《语言科学》第 7 卷第 4 期: 367-376。
- 杜道流 2005. 古代汉语动词“问”带宾语结构的演变,《语言科学》第 4 卷第 2 期: 92-100。
- 方梅 2006. 北京话里“说”的语法化——从言说动词到从句标记,《中国方言学报》第一辑: 107-121。
- 谷峰 2007. 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义——说上古汉语“云”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 3 期: 231-236。
- 金立鑫 2009. 解决汉语补语问题的一个可行性方案,《中国语文》第 5 期: 387-398。
- 乐耀 2013. 汉语引语的传信功能及相关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104-112。
- 黎锦熙 刘世儒 1957. 《汉语语法教材》,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 2006. 汉语里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从“说道”的“道”说起,《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学术论文集》110-119,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顺 2013. 现代汉语受事话题句的考察与分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 3 期: 6-11。
- 柳士镇 1989. 询问义动词“问”字宾语形式的历史考察,《南京大学学报》第 6 期: 93-102。
- 随利芳 2007. 语法标记“说”和“道”,《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 4 期: 19-22。
- 孙朝奋 彭睿 2005. 从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界面来看汉语句子融合和动词虚化,《汉语史学报》第 5 辑: 50-63。
- 邵菁 金立鑫 2011. 补语和 Complement,《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 48-57。
- 沈家煊 2010. 如何解决“补语”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 24 卷第 4 期: 435-445。
- 汪维辉 2003. 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第 4 期: 329-342。
- 吴剑峰 2009. 现代汉语言说动词研究概观,《语言理论研究》第 2 期: 14-16。
- 吴剑峰 2021. 言说动词、言语行为动词与施为动词,《外语学刊》第 2 期: 48-53。
- 邢福义 1993. 汉语复句与单句的对立和纠结,《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 11-19。
- 徐烈炯 刘丹青 1998/2007.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伯江 2000. 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语言研究》第 1 期: 28-40。
- 张伯江 2001. 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中国语文》第 6 期: 519-524。
- 张赓 崔越 2017. 《诗经》言说动词“曰”“言”“云”虚化用法的篇章功能及其跨语言共性研究,《语文研究》第 3 期: 11-21。
- 郑远汉 1983. 记言式及其结构分析,《中国语文》第 2 期: 87-92。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日文]

- 杉村博文 2004. 「中国語の受動概念」, 筑波大学現代言語学研究会編《次世代の言語研究Ⅲ》: 29-44。
- 亀井孝 河野六郎 千野栄一 1996. 『言語学大辞典』(第6巻 述語編), 三省堂。
- 木村英樹 2008. 「北京語授与動詞“給”の文法化—〈授与〉と〈結果〉と〈使役〉の意味的連携」, 『ヴォイスの対照研究—東アジア諸語からの視点』: 91-107, くろしお出版。
- 木村英樹 楊凱榮 2008. 「授与と受動の構文ネットワーク—中国語授与動詞の文法化に関する方言比較文法試論」, 『ヴォイスの対照研究—東アジア諸語からの視点』: 65-9, くろしお出版。
- 望月八十吉 1976. 「中国語における直接引用の間接化」, 『中国語学』第223号: 41-50。

[英文]

- Buchstaller, Isabelle. 2004. *The Sociolinguistic Constraints on the Quotative System: British English and US English Compared*. PhD dis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Buchstaller, Isabelle, and Ingrid van Alphen. 2012. “Preface: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new and old quotatives.”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xi-xx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uchstaller, Isabelle. 2014. *Quotatives: New Trends and 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xford, U.K.: Wiley Blackwell.
- Clark, Herbert, and Richard Gerrig. 1990. “Quotations as demonstrations.” *Language* 66(4), 764-805.
- Collins, Daniel E. 2001. *Reanimated Voices: Speech Reporting in a Historical-Pragmatic Perspectiv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Güldemann, Tom. 2008. *Quotative indexes in African languages: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urvey*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ypology 3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asund, I. K., Opsahl, T., and Svennevig, J. 2012. “By three means: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ree Norwegian quotatives”,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37-6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ch, G.N. and Short, M.H. 1981. *Style in Fiction*. Longman,
- Li, C. N., and Thompson, S.A.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Subject and Topic*, edited by Charles Li, 455-48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unro, Pamela. 1982. “On the transitivity of ‘say’-verbs.”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Syntax and Semantics 15), edited by Paul Hopper and Sandra Thompson, 301-31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Noonan, Michael. 1985. “Complementatio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2: Complex Constructions*, edited by Timothy Shopen, 42-1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shima, D. Y., and Sano, Shin-ichiro. 2012.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reported discourse: A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lliptic quotation”,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145-17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artee, Barbara H. 1973.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quotation.” *A festschrift for Morris Halle*, edited by Stephen R. Anderson and Paul Kiparsky, 410-418.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pronk, Stef. 2012. "Minds divided: Speaker attitudes in quotatives."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71-11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Vandelanotte, Lieven, and Kristin Davidse. 2009a. "The Emergence and Structure of *be like* and Related Quotatives: A Constructional Account."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 777-807.
- Vandelanotte, Lieven. 2009b. *Speech and Thought Representation in English: A Cognitive-functional Approach*.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Vandelanotte, Lieven. 2012. "Quotative *go* and *be like*: Grammar and grammaticalization." *Quotative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sabelle Buchstaller and Ingrid van Alphen, 173-20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Wilson, Deirdre. 2000. "Metarepresentation in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Metarepresentations: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edited by Dan Sperber, 411-4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